

颠覆传统思维,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同管益忻教授对话

■ 徐伟 杨子健 刘立华

(上接 01 版)▶▶▶

管:还有啊,北京最近要消灭“五小”,说“中心城区不能发展“五小”。可这就有问题了,现在上班族下了班可以就近到自由市场买东西,把自由市场“消灭”了,他们到哪儿买菜? 怎么样解决柴米油盐的问题?

郑:老百姓开一个小门店,一个人就业养活一家人呢! 这还是个公共服务问题,根本的还是靠调整消费投资的比例,提高消费占的比重,这是根本。消费和投资比例调整好了,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管:消费是在 50 到 60 之间好,是不是? 起码不能低于 50%。

郑: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这个比例始终不动不大,大约占 14%。居民消费再加上 14% 的政府消费,就是最终消费。现在关键是居民消费这块下降了,像“六五”时期消费占到 53%,现在下降到 36%,最低的时候下降到 34%,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这部分都到了投资那边。

管: 那正是民营经济发展受挫折的一段时期,好像是 1999—2001 年,这三年当中,民营经济受到压抑,被搞掉一大块。很多小企业破产或解散了,到后来又好了一些。

郑: 看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图形非常清楚,投资率是一条上升的斜线,最终消费率是向下的一条斜线,2010 年两条线交叉了,交叉了就是最终消费率与投资率相等。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一年几十万亿 GDP,最后弄了一半用于再生产,1/3 是老百姓的消费,剩下的都是出口,这种结构基本是扭曲。所以最终要进行比例结构的调整。现在这方面的措施不是很有力。

调结构要适应新的形势

管:话说到这里,是不是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扩大内需,激发消费,真正使各领域投资有效化,要注重对创新的消费结构。

郑:相对于积累,需求不足是当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另一对矛盾则是,一方面人们新的消费需求,供给跟不上,满足不了;另外一面是不需要的又产能过剩。怎么解决结构性的需求不足呢? 从根本上讲,我看来靠四大改革挖掘潜力,一个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挖掘消费潜力;第二个是税制改革,“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挖掘就业的潜力,通过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来增加消费;第三个是通过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激发创新的潜力;第四个是通过城乡一体化改革,把城市化的潜力挖出来。这四个潜力要是真正地发挥出来了,那么支撑未来十几年到二十年,一直到 2030 年,不成问题。从国际上看,人均 GDP 达到 17000 美元之前,都属于快速增长期,日本、韩国和我们台湾省都是这样的,人均 GDP 达到 17000 美元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才明显下降。我们去年人均 GDP 才 6750 美元,距 17000 美元还差一倍多呢。所以中国还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期,这个观点我和林毅夫的看法是一致的。林毅夫说只要通过改革把潜力都释放出来,到 2030 年以前,保持 8% 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管:8%是不是高了一些?

郑:8%增长不算高。要达到这个数,第一个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第二个是第三产业有就业的需求;第三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第四个是城市化。城市化率我们现在实际上是 53%,但是要按照城市户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了,如果未来十几年,一年再提高一个百分点,到 2030 年这个城市化率能达到 70%,一年提高 1.2 到 1.3 个百分点,一年 1200 万人、1300 万人进城市,再加上现有进城的农民工市民化,把老婆和孩子再接到城里来,那么这个潜力很大。这个过程,需要改革、突破,如果没有改革的突破,这个潜力就释放不出来,释放不出来,就会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现在还不能说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还不能这样说,还是不敢打这个保票。而且这几年正好处在关键阶段,6000 多美元的时候,如果你再增长那就难了。从拉美这些国家来看,人均 GDP 达到 7000 美元、8000 美元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再上到 12000(美元)以上就比较难了。因为 12000(美元)以上必须要由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转变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转变到这样的结构必须要有技术支撑。小的国家好办,像咱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如果在产品结构方面,没有一个大的跃升,就很难就保持一个持续的增长,所以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对生态环保、养老等产业要真正从产业化、正能量上做文章

管:由此,我到想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是生态环保产业,养老产业等如何真正从产业化上做大做文章,是我们应在顶层设计方面抓的要领。对这些产业传统思维往往从消极面、负担这个角度想的多,而没有或很少转变思维,真正从产业化、从正能量方面下功夫,作文章。这个思维方式得转过来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教授

郑:根本转变思维模式,包括创意密集也就是通过创新使理念释放潜力。近期有几个尖锐的问题就应这样解决。第一个是环保产业,怎样让环保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和增长点,这里面有几个认识上的误区要解决。第一个是把环境保护跟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实际上,治理环境本身就是发展。为老百姓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这本身就要有投入,有投入就要有回报,就是过去说的共享型的公共产品,没有一个价值补偿机制。现在我们通过改革,通过建立生态文明体制,就是建立共享型的公共产品的市场价值补偿机制。投资环保,治理污染,照样能够产生 GDP,照样能够有利润,照样能够交税,照样能够增加就业,把环保产业做大做强。环保产业做大做强就要形成环保市场,环保市场就是政府要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然后监督执行,要求大家都执行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关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谁污染谁付费”,然后第三方治理。以前要求谁污染谁治理,实际上是谁染污谁不治理,不治理的赚钱,治理的赔钱。现在就是倒过来了,谁染污谁付费,把钱收过来之后,政府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有资质的企业来进行治理,实行第三方治理,这样形成一个制衡机制。有了这个制衡机制,企业把脱硫、脱硝、除尘的设备都用上——脱硫、脱硝的技术很成熟,除尘技术也很成熟。据说布袋法除尘,效果可以达到 99.5%,这样工业排放的粉尘解决了。另外所有的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场,达到标准以后再排放。保证这些设施设备一天 24 小时运转,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公共产品提供出来,我们短期内就能解决总理讲的“向污染宣战”。如果没有找到机制,光空喊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下大力度把环保产业做成投资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个认识误区就是认为环境污染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说洛杉矶、伦敦治理雾霾都需要 50 年,我们不要这么着急消除雾霾。我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们有后发优势,它们那个时候没技术,现在治理污染的技术都是成熟的,设备我们自己也能造,关键是缺机制。现在是要钱有钱,要设备有设备,要技术有技术,缺少的就是机制。所以我们要发挥后发优势,尽可能在三五年之内使我们的大气污染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这完全可以做到。第三个误区就是认为煤电便宜,清洁能源贵。发一度电煤电成本现在四毛多钱,太阳能、风能要一元钱,实际上煤电成本没有把人们的健康医疗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打进去,如果打进去,那么成本和清洁能源差不多。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市肺癌现在成为第一死亡因素,呼吸道发病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有些人寿命缩短了。煤电成本如果把健康医疗成本打进去,最终也不会这么便宜。过去我们承受不了,我们穷,现在我们吃饱了穿暖了,收入提高了,这个成本可以承受了。企业消化一点,政府补贴一点,然后消费者再承担一点,实行三家摊的办法,那么就可以把这些环保设施都安装应用上。要解决这些认识上的误区,要把环保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

银行要打造出自己特有的商业模式与核心竞争力

郑:第二个热点问题就是金融。金融现在要赶紧加快改革,我们金融资本存量已经很大,M2 就超过 120 万亿了,银行的金融资

产,现在可能超过 160 万亿达到 180 万亿了。而外汇储备有 4 万亿美元。但是由于流动性比较差,其资本利用的周转效率不是很高。实体经济的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比较高,可银行的利润太高。与此相关就是你刚才说到金融业平均工资达到 9 万多元。现在金融行业净资产的利润率大概是 16% 左右,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只有 8% 左右,金融行业净资产利润率是实体经济的两倍。为什么银行的利润率高呢? 就是因为行业壁垒阻碍了资本在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本来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哪个行业的产品销售价格低于它的价值,它不赚钱,那就把资金投入到了赚钱的行业。如果价值规律真按这个实现了,按照社会需求的比例来分配社会劳动,就能实现各个部门供求的大致平衡。由于不是按照市场决定配置资源,金融行业门槛过高,阻碍民间资本的进入,所以靠垄断经营使得金融行业的净资产利润率比实体经济高出一倍,因此,金融行业的人员工资要比实体经济的工资高一倍左右。这主要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没有发挥好作用。所以现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要放宽金融准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通过竞争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贷款利率有这么几个数,美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平均只有 2.5%,日本是 1%,德国是 3.5%,我们去年是 6.15%。贷款利率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到三倍。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利润没有那么高呢? 我们资金的价格比人家的高,这样竞争力就低。原因就是金融行业垄断经营,阻碍了其他生产要素进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缺少一个企业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本来有股市,股市又搞砸了,股市对股民失去吸引力了。所以通过股市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不顺畅,而且又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上市,所以现在企业的负债率比较高。2000 年左右的时候,企业负债率平均是 70% 左右,现在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几了,有些企业高达 90%。企业负债率这么高,真是可怕。所以现在一个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一个是补充企业的资本金,降低企业的负债率。这样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形式,建立一种企业补充资本金的渠道,吸收民间资金进入,吸收社保资金进入,让它增加股本融资。

管:由此可见一个更大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化问题,严格地讲咱们几大有银行基本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基本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特定的经营模式和以特定的核心竞争力机制为主导的商业运营模式,它们主要就靠息差过日子。5 月份出现了一个银行万亿存款搬家,客户们把这一万亿移出到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他们着急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别人创造的利润是别人的劳动价值,你银行也得劳动,即服务创造价值。它们的服务很差,甚至许多时候没有什么服务,总想躺在那里赚大钱。就算有一点服务,也只是零头,这是最严重垄断造成的问题。

郑: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金融改革不配套,没有按照总体路线图来改进行。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定,金融改革是有几个配套的。要放宽准入,加强地方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几项要同时进行。去年,率先放开了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没放开。贷款利率放开以后使部分银行钻了空子,这就助长了银行的投机,出现寻租行为、逐利行为。有的银行给企业贷款怎么贷呢? 我先给你贷款利率 8%,但是要求你把贷款扣除我利润

以后再存到我的银行,银行再给企业开一个承兑汇票,企业拿着这个支票(汇票)再去贴现,贴现的时候再扣你 6% 的贴现率,实际上一笔贷款向企业剥了两张皮,等于给企业打造出了一个抽血机制。

管:就是所谓的“钱生钱”。实际的价值一分没增加,还被大大地稀释了。

郑:比如 8% 的贷款利率,然后你再存到银行,4% 的存款利率,然后你到银行自己办的贴现公司再扣一个贴现率 6%,加到一起企业贷款利率就达到 10% 了。这样便搞得实体经济不堪重负;如果把实体经济搞垮了,我们的金融也就完蛋了。

管:我们的定向降准,非常好。克强总理主持的这种作法非常棒,就是给小微、三农的,给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最近看 PMI 值,达到 50.8%,看了很高兴,增长了 0.4。可后来仔细一看,农村农民、中小微企业他们只达 48.8%,实际他们根本没有得到钱。钱又是叫央企和地方债务平台搞走了,这么个搞法是根本不行的。

郑:所以金融改革要加快,要加大力度,当前阻力很大。要是金融改革不加快的话,很可能有风险,金融出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另外还有我们的外汇储备,这么多了,现在应特别鼓励企业海外投资。通过企业“走出去”到周边,到国外搞投资,可以大大缓解这个矛盾。金融搞不好,绝对是很危险的。

房地产业发展已到拐点了

郑:再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在今年 1 至 4 月份,好多数据都在往下走,房地产的投资、贷款以及销售面积、销售额都在下降。房地产的动态不是小事,不能小看。如果房地产这个泡沫破裂,其危害性很大。日本当年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危机的,二十多年爬不出来。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也是房地产泡沫导致的。我的观点是房价要力求稳定,不要涨得那么快,慢慢涨,已有的泡沫也慢慢地消化,若十年时间房价不动,到时候房价显得就不会那么高了。像德国,房价几十年都不动。我们现在房地产已经有泡沫了,而房地产过去价格过高就是因为土地供给太少。房价上涨跟土地供给量是正相关的,关联度相当高。哪一年开发商收储土地增长了,房价马上就涨得少一点,而土地供给一少,房价马上就上来。

中国的城市建设用地,如果把农村的宅基地搞活,利用起来,在一个省内占补平衡,那么不仅可以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而且还能够增加耕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都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而中国现在整个城乡建设用地占了 22 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才占了 5 万平方公里,宅基地占了 17 万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农村人口减少了两亿多,宅基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原因就在于宅基地没有价值。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把宅基地放开,允许抵押、担保、转让,让它有了商品的属性,有交换价值了,就好办了。如果进城的农民工,允许他们有偿地退出宅基地和房产,这样就有利于城市化,进城农民可以卖掉农村的房子,在城里买一套或者租一套房子。另外退出的宅基地可以增加耕地,而且可以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这方面重庆积累的经验是比较成功的。重庆搞了四年地票市场改革,改了四年,卖地卖了 200 多亿,其收入村集体拿了 15%,农民拿了 85%。第二个是重庆市不缺建设用地,包括城市的住房建设,搞二、三产业,外面的投资很快就可以落地。第三个是这四年重庆新增加了 10 万亩耕地;第四个是形成了土地交易价格。宅基地退出 20 万一亩,那么银行以 20 万一亩进行抵押,对农民成功贷款 70 多亿。所以只要把农村闲散的宅基地利用起来,通过有偿转让,使农民有收益,珍惜土地,那么就可以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现在政府还使劲控制建设用地。另外,要打破区域的限制。你看北京,三环、四环以内,一问就是好几万块钱一平方米。但是到你周边的河北省的几个县,只有几千块钱一平方米。如果把轨道交通修到周边的涞水、固安、香河这些地方去,那么它既能带动周边的发展,又可以缓解城市太高房价。所以,好多问题是我们自己体制上的毛病,导致房价畸高。

以市场化机制解决土地问题

管:新立主任,你刚才说宅基地的厘清、整顿是大问题。好多地方的小学、中学的班分散得已经开不起来了,正在集中几个学校并起来。还有村也在合并。并村也好,并中、小学也好,这当然可以腾退出很多耕地和建设用地出来。这里特别要解决一个农民土地支配权问题。列宁在 1918 年给农民人民委员写过一条便条,说“(这快土地)谁耕种支配权就归谁。”1917 年十月革命成功,当时,苏联土地问题混乱,列宁给出了这样一个指导意见,他讲的那个“支配权”,同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承包权很相似。

郑:现在已经定了,三中全会讲了农民的

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而且确权到户。宅基地确权到户,可以转让,这样农民就可以进城,这样它就活起来了。

管:实际上它可以资本化了、要素化了,这就为城市化打了基础,成为城市化的资本。

郑:全国 18 亿亩耕地,按照现在的承包费转让,一亩地估价就是 700 块钱,一年的转包费,理论上计算可以达到一万亿,让农业公司或者家庭农场去种地。宅基地值多少钱呢? 按照重庆的价格,一亩地 20 万元,全国 17 万平方公里,合 2.55 亿亩,理论上就值 51 万亿元。

管:这个大数是了不得的。有人算城市化需要 40 万亿,这不解决问题了吗? 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另外,农村城乡结合部的小产权房问题。不知你怎么看,我看太不公不道了。实际像刚才咱们说的,像宅基地问题解决了小产权房,这个问题解决了,产权问题就好解决。你总不准给人家,那怎么行啊。

郑: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是最高原则。

管:的确,这是最高原则。而且,我最近又看了总书记的一个讲话,他讲问题导向,后面又强调了一个市场化配置。

郑:对,农村的土地资源也要市场化配置。只有市场化配置才能把闲置的资源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起来。

管:实际现在所谓市场化决定,就是产权主体决定。

郑:我近日去江西看,农村的房子都是四层楼,农民工挣两个血汗钱全都放到房子上了,盖好了放在那儿也不住。如果它要有价值的话,转让出去,在城里买个房子多好,这样也避免农民创造的财富浪费掉。出路在于市场化,市场化以后,好解决。有些人担心 18 亿亩红线,主要是没把握要领。另外,承包地可以转让的话,还可以从农村进一步释放出劳动力。现在农村劳动力还有两亿多,两亿多劳动力种 18 亿亩地,一个劳力种七八亩地,实际上一个人种几百亩都没问题的。有些农民自己不种地,别人种,可以转让出去。三中全会计得好,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如果不从这儿找出路,就没办法。

管:是的。在美国,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种了 6000 亩地,全部是智能化、智慧化。另外,最近樊纲发表了一个观点,叫农民工早退,什么意思呢? 到了城市的农民工没扎下根,他又回去了。一个是城市费用高,孩子入托入学等,要他拿钱困难。而另一方面,农村还有一块地,他就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也还是有问题。

郑:其实,不应该担心他在城里失业了怎么办、回不去、他不会回去了,因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是不会倒转的,这个历史进程怎么会倒转呢? 而且进城以后,儿子的竞争力肯定比他父母高,他在城里找一个好的工作,跟父母一块再弄个房子,他就融进城里了,不会再回去农村了。

管:一定要城市化。当然,城市化有就地城市化。比如说,四川好多地方都在就地城市化。浙江好多的地方都搞了镇级市甚至一些县级市,从规模、实力上说早已完全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昆山等不就是这样吗?

用改革推动体制机制优化完善

郑:从近期来讲,有几件事要赶紧解决好的:环保、房地产、金融,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几个问题赶紧推进。三中全会《决定》是写进去了,但长时间不推进潜力就难以释放出来。三中全会《决定》讲得这么好,把它写出来很不容易。三中全会《决定》表达了中央改革的决心,企业和老百姓看得热乎乎的,充满期待。如果我们部门、地方政府在改革上没有有一个大的举措,再过一段时间,改革可能会出现中间梗阻。好多内容改革是写进去了,好多部门有自己的解释,用传统的一套办法来解释。现在就是要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十二五明年是最后一年,关键就是要看三中全会精神能不能得到全面地贯彻落实。最后要谈的,就是十三五规划,还是把这些改革逐步落实,我们定的计划是 2020 年完成,十三五还是一个继续深化改革的一个过程。这么多年积累的体制上的矛盾要解决,今年我们各个部门可能在考虑制定整体方案,明年逐步实施。十三五还是一个改革的五年计划,中央提出来的不光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都在同步推进改革。十三五还是要把改革的旗帜举得高一些,靠改革来推动增长,推动发展模式改变。另外,十三五要继续用改革来推动结构的优化,产业升级,就是总理讲的“升级版”。它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五年计划能完成的,十三五要通过深化改革,把产业优化升级的任务完成,实现我们现在的由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为主过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优化这方面的体制,完善这方面的体制。今后几年,如果要出问题的话,可能就出在金融上、房地产上。希望通过改革把造成这些方面困难的因素破除掉。